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九期 ——  
(二〇〇六年八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8c)

---

【人物追踪】	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丁 东
【不堪回首】	“文革”批斗景观五则	莽东鸿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一)	刘光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人物追踪】

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 丁 东 •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天下大乱”。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她和其他6位同事于5月25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此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6月1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因此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因为在“文革”初期批评工作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并且在1967年分别担任这4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1967年初毛泽东将他们5人称为“五大领袖”〔1〕。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5位曾并称“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人物虽然在“文革”初期知名度很高，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其实很短暂。1968年7月28日，毛泽

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5个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2〕。然而，这次召见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得不退出历史前台。〔3〕

“五大领袖”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那时他们的许多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密切相关，与“文革”中的不少重大事件相联系。他们的回忆是还原“文革”领导层真实状况的重要参考。他们在“文革”中还担任过几所主要大学的负责人，了解当时大学“文革”运动和日常运行的状况〔4〕。他们又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述的群众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与政权的关系，与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会的关系，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笔者过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3人有交往。最近，为了解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的记忆，又分别与他们3人交谈。〔5〕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感觉国内传媒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真实的经历相差甚远。而且国内公开媒体上有关他们的信息本来就十分有限，流传较广的“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闯将封神榜》等书籍，都是一些记者在80年代撰写的，宣传意味很浓，谈不上客观真实。这5个人的命运本身就值得关心“文革”研究的人思考，而他们的“文革”记忆中则可以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分析素材。本文主要介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和他们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并讨论与“五大领袖”相关的一些问题。

## 一、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与想法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文革”后均被逮捕。刑满释放后，聂元梓的生活困窘〔6〕，韩爱晶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担任管理人员〔7〕，蒯大富90年代到深圳与朋友合伙办公司〔8〕，收入比聂、韩多一些。由于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断有人要采访，请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但是，他们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隐形政治压力。〔9〕

聂元梓最早动手撰写“文革”回忆录，她在90年代就先后与两位作家、学者合作，想撰写个人回忆录。书稿在20世纪末完成，但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这本书赚钱，和她订了合同，一看无利可图，就无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认为她写的不到位，想让她修改，她又没有能力将内容深化。此书的电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传，直到2004年才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过程中，医生曾建议她动手术，并说，如果不动手术，脊椎神经受压迫可能导致全身瘫痪。但她表示，回忆录出不来，绝不动手术。此书出版后，读者对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记忆偏重于洗刷个人的冤屈，对重大历史细节的回忆和揭示较为薄弱，有些情节不够真实。

韩爱晶近几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中去。他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调查、搜集资料与思考。今年他已完成了一篇关于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对细节是很认真的，记述也十分详细。目前他还写出一些手稿，何时发表、如何发表，还没考虑好。他表示要做一个“文革”的研究者。

我曾经对他说：你可以是历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历史的当事人；建议你第一步先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写出来，第二步再调查其他的知情人、当事人，互相比较核实；你的回忆录发表以后，自然会有许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讨论，一些弄不清和不准确的事在讨论中可以澄清。但他对写作看得很重，不想轻易出手。他基本上还保留着1966年到1968年时代的一些认知，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国内的“新左派”，对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极为反感，

因此对现行政治保持距离。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心理特征。

蒯大富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10)他也注意搜集和阅读海内外关于“文革”的材料，但当朋友们建议他写回忆录时，他总是说等退出商业再说。

蒯大富、韩爱晶现在并不回避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好感。事实上，其他历史时期的当事人往往也有类似的行为。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共同的愿望是厘清史实，澄清个人的责任。厘清史实不只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形象，也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完整。韩爱晶整理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就是一份很重要的史料。蒯大富曾对我介绍了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批斗结束后又由江青打电话让蒯大富放回王光美。这些情况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

## 二、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聂、蒯、韩希望澄清他们在“文革”中的责任，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要看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审判定了哪些罪，另一方面要看这些审判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聂、蒯、韩当时都拒绝接受审判的结果，后来也有过一些自辩。这些自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参考。

下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

1982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有5条罪状：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其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其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其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其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的干部、学生。其中的前3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所谓的上海市夺权即上海市“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革命”，这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行动。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那时聂元梓并无名气，更无资格参与打击彭真的中央决策。最早批判朱德的事发生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会议纪录，林彪、陈毅、周恩来都作了批判发言(11)，而聂并无资格与会。就这3项罪名而言，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的中央决策而已。至于聂案的后两项罪名，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任。1966年6月3日她确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部办公楼前贴出大字报，批判时任该校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常1964年担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组负责人时曾打击过聂元梓。毫无疑问，批判常溪萍是聂元梓的错误。后来，常溪萍被华东师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年5月25日在华东师大的化学系教学楼躲过监管人员的视线跳楼自杀身亡。聂案审判时，聂元梓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点是在上海，死亡时间距聂元梓在华东师大贴出批常大字报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显然，法庭对此辩护未予采信。聂的最后一项罪名是迫害北大师牛，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案。有多方材料证明，聂元梓对此案并无直接责任。

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12）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自行决定。比如原来高层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不赞成，结果改成了缓期执行。显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审判中，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法院不过是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了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

### 三、聂、蒯、韩的自辩

在这3人当中，聂元梓对审判中的罪由和量刑意见最大。她在1986年的申诉书里说：“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13）”她还再三说明，在“文革”初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她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有分歧。

聂元梓2005年11月6日对我说：“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刑律处理，那么AB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她在别的场合还说：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看见儿子就想起聂元梓。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报复。1966年，政治局开会讨论“五·一六通知”，你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她又表示：一批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现在生活困难，二七厂的徐凯连退休金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怎么也得给一碗饭吃吧。河南有一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没犯死罪，总得给基本生活条件。

蒯大富的说法是：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么？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14）

审判结束后，蒯大富对法官表示了感谢，倒不是因为法官据实量刑，而是因为法官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否则他可能要多关8年。

韩爱晶坦言，自己是卷入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时出庭的证词，至今为韩爱晶否定。韩爱晶在去年12月27日对我说：当时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给自己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未来社会献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思想非常明确、非常坚定，而且影响一生。“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好跟着毛主席干。他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的理论信念的。现在，他除了为自己没有信守毛泽东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打了彭德怀的耳光而自责外，自认为在北航较

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他率先以民主的方式“复课闹革命”；他主政时期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至今还在使用；他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没有任何“多吃多占”，甚至没有拿过一分钱公款，完全靠家里每月提供的30元钱生活；北航也没有分裂为两派。他认为，自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革命失败了，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小兵或者说是一个失败的将军。

#### 四、如何评价“红卫兵领袖”的历史责任？

一些朋友听说我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有接触，往往会问我：他们对“文革”有没有反思和忏悔？

确实，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有过一些反思。例如，聂元梓对我说：“形成‘文革’不是一天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文革’不可避免，除非五四时候彻底民主化，彻底反封建。不要怕讲‘文革’。形成‘文革’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发动者负主要责任，被发动者也有责任。彻底反思现代迷信，每个人都有责任，领导和群众都要反省。应当总结‘文革’教训，不应当回避。”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和丑化了的；对他们的刑罚与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相符，既然司法正义要求罪罚对称，所以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我发现，和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人多对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些同情者大多与“红卫兵领袖”没有利害关系，甚至在认识“红卫兵领袖”之前对他们已有不良印象，但接触之后都变为理解同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应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誉因当政者的需要而受到精心的保护，而“红卫兵领袖”这些毛泽东的追随者却承担了过度的责罚。他们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被抛弃，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都是审查对象，邓小平主政、彻底否定“文革”后他们又被判刑。“文革”时期在台上活跃了2年，后来却当了十几年的阶下囚，这无疑是命运的悲剧。他们现在是平民百姓，为人基本上是平和的，的确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有的还保持着一些当今稀缺的优点。比如，韩爱晶对某些人在管理国有资产时大肆洗钱、中饱私囊就十分气愤，他到深圳后本来有可能参与其中发财，但他出于信仰不肯与之合流。

评判“文革”中群众领袖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有如巨大的绞肉机，人要想同时保持自身的平安和清白是极其困难的。以人权为尺度，当时所有的人可以被区分为4种情况：一，整人者；二，挨整者；三，既没整人也没挨整者；四，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整人意味着不义，挨整意味着无辜。既没整人也没挨整的情况比较少见。既整过人也挨过整的情况十分普遍。

“五大领袖”都属于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当时他们的名气大，影响大，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害，虽非他们直接所为，但与他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比如，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的大字报矛头所向本来是陆平等3人，聂元梓等7位签名者中的6人在“社教”中挨过整，写这份大字报乃事出有因。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抬得那么高，确实令聂元梓感到意外。这张大字报公开广播后，许多学校的干部挨批挨斗，这岂是聂元梓始料所及？

单正平在“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15）一文中讨论过“文革”中的几种犯罪类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二是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集体屠杀；三是在全国普遍施行的“造反”——冲击政府机关，抢夺武器，临时夺取政府权力等等；四是抄家或“打砸抢”，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此外，“文革”时期“造反派”之间武斗也打死了不少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单正平视此为特殊历

史条件下的一种犯罪。他把这5种情况都归结为国家罪错，认为最终责任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比起把罪责推给“林彪、江青集团”和“造反派”，单正平的分析更接近历史真相。其实，中央和地方一些党政官员，包括后来被整死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都参与过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迫害，他们都是毛泽东、共产党“阶级斗争”主张的积极实施者。

“文革”时期，在“五大领袖”得势期间，他们在单正平所说的第三、第四、第五项犯罪类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动。至于是否应当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要看他们的具体行为。1983年对“五大领袖”以“推翻政权、颠覆政府”来论罪，显然不符合事实。“文革”初期，他们是毛泽东在其执政的特殊阶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当中央书记处的职能被“中央文革”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后，“五大领袖”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成员经常充当中央的特派员，他们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执行着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因此，“五大领袖”在主观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单正平指出：“表面上看党政机构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毛泽东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红卫兵’在他的领导下造政府的反。当时，各级政府被毛泽东及其高层助手当作‘夺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的高潮时，毛泽东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因此，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表现。”〔16〕

“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近几年，关于是否存在“人民文革”的话题引起了讨论。本文无意讨论当时一些“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甚至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感到失控的行为，是否可被称为“人民文革”。但我认为，就“五大领袖”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来看，虽然具体情形各异，但他们都是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最初都是毛泽东政治主张的真诚信奉者和追随者。他们曾经为个人权利受损害而抗争，后来为适应毛泽东不同阶段“战略部署”的需要而成为政治新星。他们的“造反”活动并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意图，蒯大富和韩爱晶至今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仍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就这“五大领袖”而言，称他们的“造反”行动为“人民文革”是不适宜的。

注释：

(1) 余汝信，“1968：7.28召见与运动的终结”([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4/06/](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4/06/))。

(2)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

(3) 出处同上。

(4) 虽然后来的文献对“文革”中大学里的斗争和冲突有一些记载，但对当时学校的日常运行状况却缺乏比较完整的记载。比如韩爱晶谈到，他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期间，组织“三结合班子”研制成功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动机，此事目前于史无载。

(5) 谭厚兰已于1982年去世。王大宾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我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

(6) 聂元梓生于1921年，1938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干部。她从1968年起受隔离审查，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受审查。1978年被逮捕，1983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保外就医，1986年假释。自1984年以后，她一直要求政府按离休干部的标准解决她的生活来源。她经过多年申诉，并得到一些老关系的帮助，直到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才开始给她发生活费，当时每月6百元，现在提高到1千多元。后来又让她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医药费报销90%。2004年给她安排了一套小三居住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7) 韩爱晶出生于1946年，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设计系）。他在“五大领袖”中最后一个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选择了湖南株洲的一个企业。1970年“清查516”时被押回学院受审查。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8) 蒯大富生于1945年，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68年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年“清查516”时被押回清华受审查。1973年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刑满释放后和一位山东籍女士结婚，移居山东。

(9) 比如，蒯大富住在深圳多年，但当地政府只准许其妻女在深圳落户口，而不让他获得当地户籍。经过多年申请，他才在山东获准得到护照，允许他出国旅行。前年，他曾接受记者田炳信的采访，但嘱其不要发表。去年田炳信发表了他们对话的内容（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kuai](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kuai)）。官方为此找蒯大富谈话。大意是这些年我们对你不错，你为什么接受采访。蒯大富说，你看，对话里我说了：“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

(10) 蒯的公司业务比较忙，所从事的行业竞争激烈，他目前的主要精力用于实现挣钱计划。

(11) 见“内幕：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peacehall.com/forum/lishi/706](http://peacehall.com/forum/lishi/706))。

(12) 引自“刘贯一致胡耀邦的信”，《聂元梓回忆录》代序第10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出版。

(13) “文革第一号造反派人物聂元梓：‘我不是反革命’”([www.kanzhongguo.com/news/gb/articles](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gb/articles))。

(14) 出处同上。

(15) 单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引自何清涟主编的《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37—248页，博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 出处同上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总第93期

~~~~~

## 【不堪回首】

### “文革”批斗景观五则

• 莽东鸿 •

题记：“文革”时期，被诬为“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平民百姓，遭受了肆无忌惮的欺凌，其中采取的类似古代的髡、墨（黥）刑，头戴东岳庙无常鬼高帽子的仿照物，和胸挂写有罪名的牌子的种种羞辱方式，风行全国。一些地方和单位，又常常各有一些特色。所使用的帽子、牌子的种类、样式愈来愈多，分量愈来愈重。

2006年是“文革”发动的40周年，结束的30周年。笔者写了一组有关“文革”批斗景观方面的文章，反映“文革”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中共中央1981年决议用语）的一些情况。可供过来人回忆那个时代，青少年则可增加这方面的历史知识。

#### 之一：从头到脚的另类标志

外形上损毁一个人的尊严，一般是“从头做起”，即败坏其头发和颜面。头发。红卫兵“破四旧”的胡乱剪发，是针对一般人“腐朽生活方式”的“怪发”，很快就转变为专对“牛鬼蛇神”的“剃鬼头”（又称“剃黑帮头”），包括阴阳头（又称鸳鸯头）、十字头，剃去周边只留中部一小撮，剃去中部只留周边一圈，或者乱铰一气，甚至将男女都剃成光头。1968年上海作协的“牛棚”监督组，勒令巴金等“牛鬼蛇神”一律剪成平头。有时是连剃带薅，甚至就是薅。有的人的头发全部被薅光。张家口有个姓王的造反派，外号叫“一把抓”，经常抓掉“牛鬼蛇神”的头发。文洁若（萧乾妻）在北京一胡同口，见到一位被薅了头发游街的老妇，她写道：“这位老太太的阴阳头却不是剃的，而是活生生地拔的。粉红色的头皮耷拉下来，滴滴嗒嗒淌着鲜血”。

保留头发对造反派也有用处：便于搞“抬头示众”。时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的王仲方的每次批斗，都有造反派抓住他的头发向后仰，他的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被一把一把抓了下来。鲁西农村的一位关姓教师，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批斗会以后，他这个当地唯一“右派分子”的一头茂密的头发，被薅光了。李井泉妻子肖里的头发也被薅光。头发还可成为施刑的一个用具，如专案组审讯东北局马明方，将马的头发揪住，“拼命往后揪，揪至面目朝天”（马明方语）。

脸部。颜面被用黑色墨汁、油墨涂成黑色（时称“画鬼脸”或“抹鬼脸”。寓意“黑帮”），还在脸上画上红叉，或在额头上写字、绘画。甚至有将一瓶或一盆墨汁，从头顶向下浇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大学生物系党总支女书记谢家极，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颜福庆等，被墨汁浇了头部、上身甚至全身。户县七中副校长王生孝的脸被黑色、兰色油墨乱画，再用红油墨打叉。1966年8月26日任仲夷被批斗的那次，红卫兵将墨汁盆对着任的头使劲往上一抖，弄得他满脸漆黑，眼睛和鼻孔里都灌进了臭烘烘的墨汁。上海的贺绿汀夫妇被墨汁兜头泼了一身，红卫兵大笑：“瞧，这对黑帮！”

耳朵也有利用价值。成都搞游斗，被斗者耳朵上挂墨水瓶，当做“耳环”。

眼睛。河北鸡泽二中教师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反派将他的眼镜摘掉，用席蔑儿插成眼镜，挂在他的眼眶上。

嘴。嘴叼物，如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及几位副部长游街时，分别用嘴叼着稻草（寓意“捞救命稻草”。中国文联的一次批斗会，十余被斗者左手各持稻草一束，亦属此意）和鞋子。甚至



口中被灌墨汁等污物。

有特征的胡子被剪或揪掉。画家丰子恺留了数十年的长须被剪去，盖叫天后来蓄起的胡须亦被造反派连皮带肉剪去，弄得鲜血淋漓。

脖后插箭标（又称标牌）、小旗甚至鸡毛掸子。1967年7月26日游斗彭德怀、张闻天，两人被插上长长的箭标。女劳模吕玉兰脖后被用削尖了的秫秸杆和竹劈子做的小旗旗杆插入，插得背部流血。除了挂牌，脖颈还可以套别的东西。兰州医学院内科支部书记被斗时，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一个铁环，铁环上又系了多根绳子，学生们手持绳子的一端，把他拽来拽去。

手及手臂。整只手常常被墨汁、油墨涂成黑色（寓意“黑手”），甚至黑及全手臂；衣袖上套白色或黑色的袖章、臂章。冀、豫、皖、浙、陕、滇等地一些城镇的“黑五类”“黑帮”，佩戴白袖套或白袖章。四川省文联和省作协设在大邑安仁镇的“牛棚”，被关押者的胳膊上套着“劳改”字样的袖章。西安市科委副主任石澜等人佩戴写着“顽固不化走资派”的白袖章。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长吴征镒、副所长蔡希陶、浦代英等人的白袖套上写着各自的罪名、姓名。安徽大学红卫兵规定该校100多名“牛鬼蛇神”必须在右臂佩戴臂章，一律用四寸宽的新白布缝制，用毛笔黑墨写上本人姓名和罪名。

腰。穿纸裙子。北影“八一三”批斗，女演员于蓝被穿上由许多纸条拼合的裙子，每个纸条上都有字，写的是：“我是周扬的红人！”还叫她大声念出来。

脚。迫令女性穿着抄家抄出的高跟鞋、绣花鞋示众。河北鸡泽县小学教师顾振中，满族人，被认为是皇亲贵族，不但迫令他戴高帽子游街，还要他穿着一双妇女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街。

有的单位要求“黑帮”穿的衣服是黑色的。在新发的职工证上，也写明此人的“牛鬼蛇神”身份。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1967年12月换发出入证，原厂长朱丹南的职务一栏，写的是：“走资派”。

理怪发，脸涂彩，穿高跟鞋等等，在当今社会不足为奇，甚至成为某种时尚，但在那个时代，被迫如此，则是一种奇耻大辱。

## 之二：形形色色的帽子

多数情况下，被斗的“牛鬼蛇神”戴的纸制高帽子，是圆锥形的，个别为筒形。帽子高度一般半米至一米，少数两米。彭德怀戴过用铁皮和纸制作、高两米的帽子。马识途戴过一丈即三米多高的竹制帽子。据冀石记述，河北省深泽县一个农村一批“牛鬼蛇神”的街头示众，戴的帽子高达1丈8尺，帽子用四根竹杆协助固定在人身上。

1998年任仲夷对当年拍照他头戴高帽子批斗照片的李振盛说：“你给我照的这张照片中的高帽子还不算是最长的（笔者按：约1.5米），有一次在省委机关造反团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一万多人的批斗会上，给我戴的高帽子比这个可长多了，还很重很重。造反派故意折磨人，他们给我戴上又高又重的高帽子，让你既抬不起头来，又不准让它掉下来。”

被斗者大都戴过高帽子。一次，李先念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回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至于基层的“牛鬼蛇神”，就更普及了。

王任重被游斗以后，造反派还给他写了一幅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予以嘲讽。王仲方回忆他当时的心情：“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

经常出现群体戴高帽的现象。1966年8月5日至7日三天，复旦大学遭到揪斗的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8月27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次批斗会，学部所属的各研究所之戴高帽者，共七八十人（其中包括翁独健、钱钟书、陆志韦、顾颉刚），可谓壮观。

帽子上还要搞花样。如在圆锥形的帽子上，配一对帽翅，或在帽尖上加一条长辫、一绺纸甚至一个纸蝴蝶。还有按官位区别的，成都的小官外加的是短短的两个圆翅，大官的长翅长到拖在地上。帽子经常有“就地取材”的，厕所纸篓、办公室废纸篓和痰盂、浆糊桶甚至尿罐、尿盆、尿桶，都上了头顶。

特制的帽子大都沉重或者形状特殊。1967年1月12日批斗张霖之，汾西矿务局制作的60多斤铁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到一分钟，就把他压趴在台上。沙河县委书记耿喜谦在农村批斗，戴的是13斤重的铸铁帽子。四川云安造反派的高帽子，暗藏玄机：外观是纸帽子，里面是铁皮尖帽，帽里还塞有一二十斤的干泥，有人记述：“这样两个小时戴下来，当官的脸上直冒汗”。

福建省体委党组女书记李威被戴上抽掉竹叶的斗笠，斗笠上挂着死老鼠、死蛇。红卫兵给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牛鬼蛇神”戴的是清代官帽、乌纱帽、博士帽。

帽子上面，常常用毛笔醒目地写着被斗者诸如“走资派”“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等等罪名及姓名或口号。姓名通常被打上红×（表示对此人的政治否定或“判决”：此人已被打倒），有的字倒写（表示轻蔑、敌视）。

辽宁省新邱露天煤矿勒令各单位“牛鬼蛇神”去支援彰武县农场夏锄，给他们每个人发了秫秸编的遮阳帽，帽顶上用毛笔写上醒目的姓名与罪名，胸前别着白布条名签。1966年底北师大红卫兵到曲阜砸“三孔”，砸下来游街的孔子头部塑像，戴了一顶硕大的帽子，上写：“打倒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有的单位的高帽子由“牛鬼蛇神”用纸自制，可以折叠或卷成筒形。他们一般将它藏在口袋或挎包里，快到单位才戴起来。当时传说，侯宝林自制的帽子能够伸缩，被批斗时，他自己变换帽子的高度，说：“够不够高？不够可以再拉。”当红卫兵喊“打倒侯宝林”时，他“不打自倒”，立即趴下，说：“您甭打，我自己趴下啦！”“文革”后方成问过侯宝林，是不是真事，他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

### 之三：五花八门的牌子

人的胸前，是除了颜面、头发以外，仪容美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有“美在胸前”之说。这块“风水宝地”，“文革”时被充分利用于对“牛鬼蛇神”的丑化：通常是在批斗、游斗或示众时挂上牌子（时称“挂黑牌”）。后背也被利用，如贴大字报和直接写字，甚至画污辱漫画。季羨林的背部就被画了一个大王八，他看到一个被迫害成半傻的学生，背部也被画了一个大王八。有时在搞“背朝天”大弯腰游街时，后背可以挂上牌子。还有在胸前、后背各挂一块牌子的。

牌子多数用纸、木板制成；大小不一，一般是长约一米，宽半米多的矩形，或半米长宽的方形。牌子上书写此人的罪名和姓名。如同高帽子上的写法，姓名或姓名中的某个字，常被倒写，打上红叉。罪名的写法也有别样的，如“我反动，我该死”。还有画鬼头、毒蛇等漫画的。

有些单位的造反派在牌子的种类、重量和挂绳方面，不断搞花样，重达十几公斤的硬木板、铁牌，以及砖头、闸瓦、铃铛、秤砣、哑铃、杠铃盘、铁炉、炉圈盖、垃圾箱、粪桶等等，也成为悬挂物。挂绳有时改为细细的铁丝、钢丝。于是，重10公斤的大牌子出现在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的脖子下。北大荒友谊三分场二队给刘瑛（我国第一个女收割机手）挂的是拖拉机支重轮（每个重17公斤），每次批斗后，刘瑛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把衣服都溷透了。一个被遣返回农村改造的“右派分子”，脖子下挂的是一颗树。

有人当时还是少年，如今回忆起当时所见情景，仍历历在目。陈凯歌：“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场，……他们用细细的铁丝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丝没入肉内”。有人回忆：“我依仗人小，挤到了最前排，看得十分真切。‘地主分子’（笔者按：医院的一位老大夫）‘坐’着‘喷气式’，脖子上挂着一个沉重的木头牌子，而那悬挂牌子的竟是一根极细的铁丝，铁丝深深地勒进后脖颈的皮肉中”。

穿纸背心，纸孝袍，纸斗篷，纸衣。夏衍在文化部集训班被批斗，身穿写着两个醒目大字“夏衍”的纸背心。目击此景的于蓝马上想起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中，德国法西斯对待犹太小女孩的精神侮辱，那女孩的背上写着“犹太”二字。

在身上挂、粘长纸条。1966年8月中旬，北京市委机关和工青妇上百个干部被集中到居庸关南口集训，临行前，有些人的身上被挂上写着“黑帮×××”的长纸条，廖沫沙的纸条拖到了地上，他只好将“纸尾巴”塞进口袋里。季羡林背后的衣襟曾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他的“考证”是：“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

马识途当时在《凝眸》诗中，提及了挂牌和戴高帽：“文章奉命皆‘修正’，‘赤匪’而今变‘黑帮’。高帽人夸冲斗汉，黑牌自顾笑荒唐。”

那个时候，凡不服从剃阴阳头画鬼脸以及挂牌戴高帽者，即被拳打脚踢，有些人不堪凌辱而自尽。多数被斗者怀着“两个相信”和“前途是光明的”的信念，忍气吞声备受欺凌。

有些蒙难者也就不太以为意，有的人甚至采取蔑视的态度。湖南师范学院教师吴容甫戴高帽挂牌子，手里提着大铜锣，却昂首挺胸，旁若无人，把铜锣敲得震天价响。街上一个旁观者说：“看，这个走资派，多神气！”上海雕塑家张充任顶着阴阳头上下班，昂首出入，每日往返于长乐路单位和合肥路家之间。他的想法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认为我自己剃的，我不耻于阴阳头在光天化日之下展览，公众绝不会以头发的美丑判断我的善恶，而只会去评判此‘杰作’发明者的心态。美丑善恶、是非曲直、黑白阴阳，大众心目中自有一杆秤。”

#### 之四：站立低头弯腰下跪

站立、低头、弯腰、下跪、爬，是“牛鬼蛇神”被示众、批斗及体罚时的姿态，用当今文雅一些的语言说，是对“另类”实施的一种“行为艺术”。在这种强迫“牛鬼蛇神”由直立“回归”至类似四脚动物爬行的“返祖”过程的各种姿态中，往往还有进一步的残害。“踏上一只脚”，则是发扬“痛打落水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对匍匐在地的“牛鬼蛇神”，添加的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行为艺术”，以显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英雄”形象及强大的

专政力量。

站立，确切的说是罚站，广泛应用于各类示众和批斗中。站立时，经常被要求俯首低头，以示其有罪、服罪、认罪，或“态度老实”，除非叫你“抬头示众”。天津作家何迟被罚站，两手还要平伸，稍有晃动，就要遭打。

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冯英子的头，被摁进了垃圾箱。吉林某地质大队的技术员李素能、干部王中静的头，则被摁进猪粪池中，还几个小时不让洗涤，“污泥”在他俩的脸上结成了一层暗色硬膜，说起话来，只有眼白和露出的牙齿是白色的。较短时间的站立、低头还不太难受，长时间的站立和低头就成为一种苦难。

弯腰，有时甚至是九十度的弯腰，常见于示众及批斗会，游斗也有。就整个身躯来看，弯腰比低头的曲率当然要大得多，受力的重心转移到了腰部。弯腰时间稍长，许多人痛苦难耐。

胡乔木在一次批斗会上因弯腰过久，弯腰“度数”太大，双腿麻木，散会后无法走路，由两个人搀着才勉强走出会场。1968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批斗大会，王力、朱德熙等教授弯腰九十度，背上还被压上了砖头，时长两小时。一次在北大校园斗王光英，王光英的身子弯成像U形的马蹄铁，不准他伸腰，他的汗与泪，像水那样的往下淌。于蓝发现导演成荫双腿附近有黄豆大的水点滴下，误认为是他的泪珠，“我再仔细看，原来是他不堪这九十度的大弯腰，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不断地落在土地上。”

还有另一种姿态。兰州医学院管理牛棚的政工干部，要求身高1.8米多的一位内科副主任，在列队出工、收工时，必须与手中的铁锹等高。李蕴辉看到，“他只得缩脖、弯腰、屈膝行走，呈半蹲下状，宛如舞台上扮武大郎者。”

批斗或示众时，常常要求被斗者下跪，以进一步表示其另类地位的低贱。中国地质科学院及中国评剧院，分别出现过几十名科学家（学部委员谢家荣亦在内）、干部和演员跪倒一大片的现象。上海作家20多人跪在作协大厅里，巴金、吴强、孔罗荪、王西彦、魏金枝、师陀跪在前面。在甘肃天水某部队操场也有过许多人下跪示众的场面，在第一排里有严寄洲、黄胄、王愿坚，总政文化部陈其通、姜思毅和几个少将。

在红卫兵发动一起“革命行动”之后，在“小将”们铜头皮带的挥舞抽打之下，和“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的声讨声中，1966年6月7日，安徽大学几十名教授、讲师，直挺挺地跪在水泥篮球场上。上海戏剧学院“狂妄兵团”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大会，“牛鬼蛇神”跪在地上一大片，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其中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丹尼（金韵之）。

下跪时，造反派给痛苦中的“牛鬼蛇神”还要增加痛苦。一是有碎玻璃碴、炉灰渣、小石子铺的地，水泥地，洗衣搓板，砖头，瓦片，桌子，凳子，铁棍，角铁，钉子板，汽油筒盖……都成为膝盖下的垫底。北京大学附中女职员李洁被毒打以后，红卫兵学生迫令她跪进了一只抽屉里，结果动弹不得。云南玉溪还规定了下跪的“标准”姿势：双手举高，头低到胸部，两腿跪直，臀部不准靠着脚后跟。

## 之五：爬·踏上一只脚

爬，像狗、龟一样在地上爬行，据说这是为了“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

在北京许多中学校园及居民区流行过，如第101中、女三中的教师们，被迫在煤渣地和铺着碎玻璃碴的地上爬行，煤渣、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当时在东城区麻线胡同小学读书，后来写了《梅花党》的张宝瑞看到，他们班的熊姓女班主任被学生栓了一根绳子拉着，在地上学熊爬，“熊老师很胖，她被拉得气喘吁吁，我当时非常伤心”。北大附中女副校长刘美德一边爬还要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上海某中学三好学生闻达爬着还要学狗叫（寓意“狗崽子”。闻父是“历反”）。

盖叫天、王昆及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北京第三女中的女教师），都被迫在地上爬。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在地上爬行时，头上还套着一个浆糊桶。该校从香港回来的女教授李翠贞被迫从低矮的绳下爬行，又趴在地上用粉笔写：“我是老妖精李翠贞”。复旦大学包括苏步青在内的一批教授被逼令在操场上爬，还要潘世兹从红卫兵裤胯下钻过去！据后来成为该校“红三司”头头的安文江记述，红卫兵还要苏步青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爬：“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

陕西师大第一附中红卫兵强迫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在操场上进行爬行比赛，规定谁爬得慢就要挨打，结果校长史青云落后了，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梁伦（华南歌舞团团长、舞蹈家）的批斗会结束时，舞蹈队的一人在他后面踹了一脚，大喝一声：“爬着滚回去！”梁伦口衔装着检讨材料的袋子，爬出了会场。有的农村开完批斗会，规定地主富农必须爬着回家。

某工读学校校长还被迫趴在冰上，红卫兵说：“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吧”（该校长讲过二十四孝）。原驻苏大使刘晓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由于被认为不坦白，也被审讯他的办案人惩罚，迫令趴在冰上。

四肢落地的“牛鬼蛇神”，背上又被踏上了一只甚至几只脚！

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大会发言中说：对刘少奇不仅要踏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出卖了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因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干部。1967年10月25日张家口市集会，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以及胡开明、葛启、解峰等人，还提出了“一万只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北京日报》记者拍摄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英姿”：副校长刘美德跪在一张桌子上，“英雄的红卫兵”把脚踩在她的背上。照相之后，刘美德被一脚踢了下来。1966年8月23日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举办“黑画”展览，年近六旬的叶浅予被推倒在地，仰面朝天，一个红卫兵在他的胸膛上，踏上了一只“革命大脚”，另一红卫兵拿起照相机拍照留念……

□ 原载《杂文报》第1786期，第1790期，第1794期，第1798期，第1802期（2006.2.至2006.4）

~~~~~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一）

• 刘光耀 •

## 一、初闻“造反有理”

1966年夏，我和开封师范学院的许多教师、干部一起，正在通许县参加“四清”运动。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5月10日，报纸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及此后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有时间读（对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也曾是如此）。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揭发批判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我没有听也没有看。6月3日，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我震了一下，似乎明白了：“北大成了‘三家村’黑店的重要据点，前北京市委是邓拓之流的后台老板。”我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朴素的热爱和信任之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说明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如何的尖锐和激烈，在党内确实存在着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有些人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列主义，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整日守在毛主席身边竟然反对毛主席，实在令人气愤！”6月6日，“四清”工作组领导布置于当晚召开社员群众大会，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动员大学毛主席著作。6月7日，工作队员写声讨邓拓“黑帮”的大字报。我写道：“我是党的忠实儿子、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谁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和他拼到底！”

6月10日，由开封师院包下的孙莹大队的大部分工作队员回校，留队17人，又从开封地区补进一部分新队员。三个月后才知道，此举是因为6月5日师院艺术系部分学生揪斗了“反动学术权威”武秀芝，全院开始乱了。这就是河南省有名的“6.5”事件，开封师院以及开封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从这里开始。这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后，其它城市响应造反最早的一家。

6月底，开封师院的留队队员又返校一批，只剩下数学系4人留队，工作组长换成了地区干部。对于学校的消息，我们全然不知。8月底的一次工作组核心会议上，组长透露，开封师院的学生抬着“造反有理”的大牌子上街游行。我当即追问：“共产党领导的天下，造谁的反？！”没有任何人答话。我懵了。

9月4日天快黑时，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4名队员全部返校。夜11点左右，接我们的卡车才到，到校已是5日凌晨。一进校门，我们在车上借着微弱的路灯光看见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大标语上得知，院党委第一书记韩倩之已被罢官。我们4人中，陈顺卿在校内有家，剩下我们3个单身就暂住在系办公楼一个大教室内。一放下行李，脸还没洗，徐兴辰、张佳魁就说，咱先写一份表态大字报贴出去再休息。我当然积极响应两位共产党员的倡议。因为陈顺卿是党总支委员、系副主任，就避开他而以我们三个的名义，由我起草了以《三颗红心》为标题，向“最敬爱的党、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表态的大字报，表示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认真学习、掌握《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于我们尚不知省委罢韩倩之官的理由，在表态大字报中就没有提及此事。

在返校的头几天，我教过并且一起到农村参加劳动而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数学系64级的几位同学，多次到我房间，给我送材料，要求我好好学习，不要急于表态支持哪一派。他们都是八二四造反派骨干，对我很关心、很热情。他们的行动使我体会到，希望我支持他们。

通过几位同事，以及八二四同学给我的材料，我了解到：

1、6月5日，艺术系女教师武秀芝，被她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带领一班人揪斗。在“6.5”事件之后，各系都揪斗了“反动学术权威”。数学系也揭批了本系以讲师孙荣光为“村长”的“小三家村”。在揭批“小三家村”“村民”、讲师傅熙如时，硬说傅写有“黑诗”，逼他交出，把他快逼疯了，头直往墙上撞，而且跑回家，又被抓了回来。

2、开封师院秩序大乱之后，开封市委根据中央精神，派工作组进驻师院。他们和院党委一起，设法平息混乱，让学生学习有关文件。同时，让各系党总支对造反的学生进行排查，整理资料。院还成立了“文革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造反的学生对工作组不满，发生了摩擦。各单位分四类对教师、干部进行排队。一类是最好的，四类是阶级敌人。数学系的孙荣光被定为“三类半”。党委指示，数学系教师中没有四类，可以先把孙荣光按四类批判，到运动后期定性时再说。

3、在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一帮造反者把矛头立即指向主持院党委工作的院长、党委第二书记曲乃生（第一书记去搞“四清”了，“6.5”事件后回校）。7月22日，大礼堂批斗曲乃生时，在学生发言中，逐个点了各个系的“反动学术权威”，令他们上台挨批。数学系上台的有孙荣光和刚30岁的“资产阶级教授”张世德（张只是个助教。一位劳动模范出身的化学系女学生诉苦时，说“资产阶级教授”张世德如何迫害她……）。上台的有80多位。工作组是这场批斗会的组织者，工作组组长和韩倩之坐在台下前排指挥。

4、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开封师院煽风点火。他们爬到大礼堂、七号楼和校大门上边，把他们认为是“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古建筑装饰砸掉。在他们的煽动下，师院和开封市到处都掀起了“破四旧”的狂风。开封二中还办了个“破四旧成果展览”，其中有许多珍贵文物，有的文物后来竟“丢失”了。

5、8月24日下午，韩倩之在大礼堂作报告之后，院“文革委员会”主席侯志英接着讲话，其间，突然响起鼓声，几十名学生高呼口号上台，夺话筒。这一下激怒了众多师生。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对愤怒的学生说，你们也可以上去！几个学生带头，又上去更多的学生围攻造反者。造反者围坐在毛主席画像周围朗诵毛主席语录。这时主持人让侯继续讲话。侯又讲了几分钟，就宣布散会，想把造反者“晾”到那儿。大家离开大礼堂后，有人发现造反者整队上街了，估计他们会去市委请愿，于是，有人就组织一帮人跟上去“消毒”。“消毒”者到市委不见造反者的踪影，就又追到开封地委大院。地委领导接见了造反者，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在“消毒”者的要求下，地委领导接见了“消毒”者的代表，表示理解这帮人的意思，劝他们好好学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就是闻名河南的“8.24”造反事件。在“8.24”事件中，韩倩之的金壳手表不翼而飞，找不到下落。

6、“8.24”造反者立即赴省委请愿，与其对立的学生也赴省委反映情况。省委表示支持造反者。当党委得知消息后，韩倩之率领部分师生到开封火车站迎接他们。但造反者不买账，不乘坐韩倩之派的大轿车，而是整队呼着口号步行到校。此后，造反者组成“八二四革命造反战斗队”（简称“八二四”）。

7、和造反者对立的学生头头，在郑州看到某高校“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受到启发，回校后就组织类似的大型活动。让曲乃生排头。让党委书记杨纪高脱去鞋袜插在上衣口袋里。差不多人人戴高帽。数学系一个学生把盖痰盂的带长把的木盖，倒插在孙荣光的后衣领内。有一个后勤一般干部，只因男女作风问题，也让他游街，而未戴高帽，一个学生把半个西瓜皮扣到他头上，另一个学生把一个小旗插在瓜皮上。当游街队伍返回到校门口时，指挥者令他们停下来，为首的站到凳子上，指挥者拉着腔问：“你是啥东西？”被问者须答：“我是牛鬼蛇神谁谁”

谁”。然后指挥者喝令：“滚蛋！”便从凳子上下来，再由他学着指挥者的腔调问下一个。轮到艺术系教师刘铁华，刘答：“我叫刘铁华，是个赖蛤蟆。”院团委干部牛效明，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轮到他时，他用三句半答：“我叫牛效明，是条害人虫，一肚子肮脏水儿，孬种！”

8、9月4日，省委派一名副书记来开封师院宣布罢免韩倩之的职务。

9、造反派组织了多次在大礼堂批斗韩倩之的大会。其中一次，用铁丝给韩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大钢板，上书“走资派”，脸上画了个大黑叉。钢板压得韩的头越来越低，致使钢板碰到地板，发出响声，大会主持人才让两个学生摘去那块钢板。

“6.5”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许多教师被学生用大字报点名批判。由于我上大学时受黄敦慈等老师的影响较深，在教学中要求比较严格，数学系62级学生就给我贴了专栏大字报《看刘光耀的教学观点》，有两句顺口溜：“看见刘光耀，心里吓一跳，看见耀光刘，心里直发愁。”一次，我到大字报资料保管室和同学聊天，62级学生赵保当对我说：“刘老师，看一下写你的大字报稿吧。”而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我满脑子都是问题，哪有心思顾得那些，就说：“现在顾不上，以后再说吧。”其详细内容，一直没有看到。

返校后我目睹的第一幕闹剧是：“院文革委员会”被造反派勒令取缔，门被封，侯志英戴着约两米高的高帽子在大礼堂被揪斗，揪斗后，侯志英被打。这哪里是搞文化革命？！我和张佳魁尤其想不通。9月7日，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写了一张简短的大字报《我们坚决拥护“用文斗，不用武斗”》，全文如下：

我们主张敢字当头，敢于斗争，但在斗争方法上，我们主张：

- 1.动笔动口不动手，不打不骂。
- 2.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罚跪，不接头。
- 3.要彻底揭露，充分说理，彻底批判。
- 4.要让被斗争对象先交代，开展辩论式的斗争，防止逼供信的做法。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十六条》中指出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精神的。这样做，会更有利于彻底暴露敌人，孤立敌人。我们不希望再出现违背《十六条》精神的斗争方法。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望同志们讨论。

刘光耀 张佳魁

1966.9.7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数学系64级造反派学生找我来了，他们要我好好学习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要深刻领会其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939.12.21《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还要我好好学习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学了，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哪个年月讲的，在共产党领导、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也要像那样做吗？我不理解。我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中所规定的政策，应该是我们当前行动的指南。于是，在9月9日，张佳魁、徐兴辰我们三人经过认真讨论，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斗准、斗狠、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在充分肯定红卫兵无所畏惧敢于造反的精神之后，根据我院运动情况，直率地讲了四个问题：



一、捍卫《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表示：谁如果违背《十六条》，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二、明确运动重点，看准斗争对象。其中讲了四点：1.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认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死心塌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方针路线的那些党内领导人物。要本质地、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3.如何理解“炮打司令部”？要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要把因认识问题而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领导人以及在工作作风、工作上犯有错误的人当作敌人来打击。4.对于那些由于材料揭发还不够充分，还不能确定是敌我矛盾的，暂时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

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运动搞深搞透，使运动健康发展。强调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处理；强调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提出了坚持文斗的三条理由。

四、呼吁有分歧的各红卫兵组织团结起来，矛头一致对准敌人。

这一篇长文，造反派不理睬，和造反派对立的学生抄下来油印成了传单。造反派学生看我不可能支持他们，也就不再找我了。

我为什么决心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虽然我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内在原因，不知道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只笼统地知道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把我孤儿寡母的家庭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母亲和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感恩戴德；而且我从来不怀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因此，抗美援朝中我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初中毕业时积极报名参加航空学校学习，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这次“文化大革命”，我当然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其中。

我为什么不支持造反派？第一，开封师院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但是，像艺术系的武秀芝、数学系的孙荣光等，只是本单位的学术水平相对较高者，还谈不上什么权威；至于“反动”，则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所以，要批斗这些先生，要“革他们的命”，要造他们的反，我不赞成。

第二，说以韩倩之为首的院党委搞修正主义、韩倩之是走资派、以侯志英为首的“院文革委员会”是韩的御用工具，通过造侯志英的反进一步造韩倩之的反，我想不通。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这些概念在我的脑子里是抽象的笼统的模糊的，我没有见到过具体的模式。从我的主观感觉，不认为韩倩之搞修正主义，他不是走资派。

第三，我这个人虽然思想单纯，性情急躁，直爽有余谨慎不足，经常犯说话不顾对象不择场合不讲方式的错误，但我是实事求是的，历来反对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更反对在对人的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在浮夸风盛行的1958年，我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在参加“四清”运动中，我不赞成“在发动群众的运动初期，不要怕过火”的主张；在对待通许县领导点名的、我所在生产队队长的问题上，是谨慎的，未乱煽风点火，逼他交代问题。因此，我被工作队某领导说成是“右倾”，挨了批评，从而在发展党员时没有我的份儿（我的入党介绍人已经向我点了此事）。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采用明显违背《十六条》的二十年代湖南农民革命的办法，我当然极力反对。

以上三条，正是我“文革”之初和许多同志一样就持“保守”态度的根源，也是我此后越来越“保”的思想基础。

## 二、两派群众矛盾激化

《十六条》颁布以后，市委工作组撤离学校。在院党委的指示下，各基层单位都组织了“红卫兵”，而且名单是经党委审定的，都是“可靠分子”，有学生，有教师，有干部，按军事编制。在八二四造反之后，以这些“红卫兵”为基础，成立了“红卫兵战斗师”，它是开封师院最大的“保守”组织。战斗师成立后，中文系和政教系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战斗队”，其它系也有少数学生加入。没过多久，井冈山内部分裂。政教系的大部分从中分出，组成“东方红战斗队”，它是八二四的兄弟队，但造反性比较温和。井冈山是最先造开封市市委书记徐学龙的反的队伍，但它反对八二四那种武斗等激烈行为，又不赞成战斗师的“保皇”立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井冈山对八二四越来越反感，而逐渐成了战斗师的友军。此外，物理系部分学生成立了近于八二四的“八三一战斗队”；近于战斗师的学生组织还有“狼牙山战斗队”和“春雷战斗队”。

韩倩之被罢官的直接结果是，院党委机关和各基层组织陷于瘫痪，广大党员、干部陷于迷惘，不知所措。一位在党委机关工作的一般干部，到几个系的党员中活动，要大家想办法看咋办。于是，几个系的党员代表，一起去找市委。市委一位领导接见他们时说：“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你们还能来找我们，我们感到欣慰。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们就放手干吧，在游泳中学游泳。”他们又去找省委领导，也无获而归。习惯于以党的“驯服工具”要求自己、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行动的广大党员，虽然有中央《十六条》作指南，但无基层组织的指导，他们还是茫然找不到北。渐渐地，中文系教师中的几个党员意识到，应当支持造反的八二四，于是他们就组织了“卫东战斗队”；9月中旬，以数学系、外语系、体育系的几个共产党员，就在教师中组织成立了与之对立的“遵义战斗队”，意在要像中共中央遵义会议那样，来扭转开封师院的“乾坤”。遵义队包容了全院教师、干部中73%的中共党员，大部分靠近中共的积极分子加入其中。数学系的大多数教师、干部组成“遵义二分队”，张佳魁任分队长，我任副分队长。

除了卫东队和遵义队，师院教师、干部中还有支持八二四的“东风队”和支持战斗师的“长征队”、“延安队”（后并入遵义队）；支持八二四的工人组织是“赤卫队”，支持战斗师的工人组织是“二七队”。

少数出身不好以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党外干部和教师，被排斥在群众组织之外。

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立场、观点截然不同。八二四一方认为，以韩倩之为首的院党委，长期以来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不同意见，使一部分群众精神上受压抑，韩是走资派，按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理论，应该造他的反。这一派人数虽少，但仗恃“造反就是大方向”、“大方向正确，一切都正确，即使方法错了也没啥”的歪理，他们的胆量特大，能量也特大，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国法党纪，一概不予顾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则不认为韩是走资派，他们反对乱揪乱斗；甚至认为造反者一方中有极少数坏人，或者有坏人做后台，煽动他们进行捣乱、破坏。这一派人多势众，自恃对毛主席、党中央最忠诚。两派都自认为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于是，双方以大字报和口头辩论形式互相攻击。在对待领导人的问题上，八二四一方批斗韩倩之；战斗师等一方则批斗曲乃生，认为曲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后台和保护者。战斗师等一方也认为应该造走资派的反，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找“走资派”，他们去揭批开封市委书记徐学龙。八二四造反，徐学龙贴大字报支持；井冈山和战斗师揭批徐学龙、曲乃生，八二四却保护他们。双方互骂对方是“保皇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派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凡不支持自己的，都是；支持自己的，都是好干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是少数。双方

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派仗越打越激烈。

9月13日，八二四以搜查工作组整他们的“黑材料”为名，砸、抢、封了院及各系机要档案室。共产党员、政教系教师袁国选，发出保卫档案的《共产党员的呼吁》，紧急呼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保卫机要档案。但未得到响应，全院出现一片沉寂气氛。

10月初，在造反派学生的压力下，开封市委先后罢了物理系党总支书记翟子荣和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戴鸿儒的官。

此后，我率领遵义二分队和战斗师第三营（数学系学生）一百多人到开封市委找李浩副书记辩论，质问戴鸿儒被市委罢官的理由。李浩除了说戴鸿儒曾在一个很小的会议上说过“八二四比他妈的57年右派还厉害”之外，其余就含糊其词支吾其语。李浩被我们驳得哑口无言。我们强烈要求市委为戴鸿儒复官。李浩哪敢答应。我们体谅李浩的难处，同意他让大部队回校、留几个代表和他谈的要求。我和一名干部、一名学生留下。这时天已经黑了，李浩让我们和他一起吃面条。饭间，李浩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表示同情我们，说市委也是无奈。我们也深知，今天的行动只是制造舆论，给市委一些压力，市委是不可能为戴复官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此后，各系、部、处凡不支持造反派的负责人，都被造反派揪斗，而无须市委发文罢官；政教系学生辅导员申忠诚等也被批斗。

10月下旬，两派学生多次发生摩擦，“老保”有几十人受伤，政教系女生王秀莲等10余名受重伤，王秀莲在被推搡中有人用钢筋棍打她头部，严重脑震荡，至今未愈。

10月31日，八二四夺了院广播站。接着，又发生了二七队三名老工人在和八二四学生辩论中被打伤及全院炊工罢工事件。双方斗争趋白热化。

开封师院由极少数学生揪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院党委和工作组对其压制；然后是从少数学生登台开始，造韩倩之的反，另一部分学生起而围攻，逐渐形成全院对立的两大派。中共开封师院党委也被分成以韩倩之、赵文山（副书记）等多数委员为一方，以曲乃生、杨纪高和刘定一（委员，红军老干部）等三人为另一方的两部分。但是，和中共中央1962年以来刘少奇等推行的所谓“右”的路线、政策不同，韩、赵等一直执行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的所谓“正确”（实际上是左）的路线、政策，而曲、杨等在历次运动中则常扮演“右倾”人物而遭受批判。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韩、赵等被造反，而曲、杨等则成了造反派的保护对象或支持者。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党委主要领导人，都是执行毛泽东的那一套，可现在却都变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者”。这在逻辑上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 三、1300人大军徒步赴京“告状”

在9、10月份，开封师院就有共产党员到省委和中南局反映情况，均得不到支持。目前形势越来越恶劣，怎么办？遵义队等几个“保守组织”的头头一起商议，决定集体步行上北京找党中央告状。

11月3日傍晚，1300多名师生员工，扛着大红旗，唱着革命歌，背负行囊，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开封师院出发了。大队出发前，早有几副担架抬着王秀莲等重伤员先行。大队到了黄河大堤，因渡船受限，除一小部分过河外，大多数就在大堤上睡了一夜。次日赶到封丘县城。

每到一处，先遣队都给安排好了食宿，当地干群都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省委对这支全国罕见的步行大军相当关注，给沿途各县、市都打了招呼。

我们在封丘停了三天。在决定赴京之前，战斗师师长林庆兆（数学系63级学生）等去省委找纪登奎，纪说，不要去告状，你们可以出去看看，省里给拨钱。林庆兆等赶到封丘找大部队。驻京联络站的侯书山（物理系教师）等通过电话得知要大军赴京告状，也立即赶回开封师院，又很快追到封丘。他们对指挥官们说，不能告状，东北已有抬着重伤员告状的先例，中央根本不理；况且我们的人全部离开学校，万一告状不成，必然队伍涣散，组织要垮，连老窝阵地都没有了。几个指挥官之间也有分歧，林庆兆和总指挥官、井冈山头头张本乐（中文系62级学生）等，力主返校，而有的指挥官则力主告状。相持不下，就召开全体会议，让大家讨论。会议争论很激烈。一个教师指挥官的情感演说，征服了不少人的心理。他说：“八二四如此欺负我们，使我们在学校无立足之地，省委又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咋办？不去找党中央告状，能对得起那么多被打伤的同志吗？要继续走，队伍拖垮一半，死几个人才好哩，我们抬着人也要走下去！”于是，主张继续告状者占上风。但对这最后一句不理智的话，当时就有人私下提出质疑。

大队到安阳又停了三天，让大家“休整”，头头们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继续北上，但不再提告状，而改为“长征”。担架上的伤员改乘火车。有两辆卡车准备载走路困难者的行李和伤员。我们每天走百十里路，相当艰苦。许多人脚上打了燎泡仍然坚持步行，只有少数实在走不成路的才坐一段车。我的脚病犯了，脚趾和脚面溃烂，疼痛难忍，买了几尺白布裹紧双脚继续走。指挥员还组织了一次夜行军。眼睛不好、外号“老瞎”的数学系教师王高敏，手抓着我的肩膀，紧跟在我的侧后走。凌晨四、五点钟瞌睡得要命，我闭着眼睛“瞎走”，不知咋的，方向走偏了，一脚踩空，差一点儿跌进公路边的壕沟里，才被惊醒。我和大多数同志都是坚持步行到底的。所以，后来有人批判我们是“假长征”时，我们当然不服气。

大军从开封出发不久，八二四就组织了一支自行车队，带上纸张、油印机，有时尾随在后，有时提前到我们将要宿营的县、市，一路散发造谣、攻击我们的传单，甚至说我们“厕在老乡的锅台上”。我们只管走我们的路，不予理睬。

长征一路搞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在邯郸瞻仰了烈士陵园。到邢台访问了地震灾区的农民。在石家庄瞻仰了烈士陵园和白求恩墓，听了白求恩医院院长的报告。到保定又折向西北的狼牙山麓，请抗日英雄做报告；参加农村劳动，和农民举行联欢会；并登上狼牙山峰，极目远眺，体会毛泽东词“倒海翻江卷巨澜”的磅礴气势。长征大军有一支文艺宣传队，他们是先步行一段再乘卡车提前到达宿营地，晚上给当地群众演出文艺节目。这是一支以艺术系学生为主的精悍的高水平宣传队，很受沿途群众欢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演出，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照片见诸报端。

11月27日，1300人的开封师院长征大军，步行1700里，到达北京，住在北京农机学院。后来听说，究竟住在什么地方，驻京联络站的同志和长征指挥官之间有分歧。联络站早已联系好一所受北京造反派影响小的较偏僻的中学，他们认为，住在那里可以保住我们的队伍不垮。但有的指挥官认为，我们是大学，应该住在大学里边。在北京，我们访问了时传祥领导的环卫队，背起大粪桶，体验掏大粪的苦乐。此外，没有别的集体活动，大家分散地到各高校参观。

北京的形势动摇了我们这个队伍的军心。本来我在“四清”地区返校之前，已经从报纸上注意到了中央领导人顺序的变更，当时还有所议论，意识到刘少奇犯了错误。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党中央会出修正主义。10月1日，我曾作为群众代表来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活动，我被编在离天安门最近的方块队里。在那人海里，透过有些灰蒙蒙的大气层，我

看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我在多年前从肖像上就已经熟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那时，我还意识不到刘少奇会被打倒。然而我的心情在通许回校前就已经开始有些沉重。我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但绝无年轻红卫兵那种激动的情绪。这一次来到北京，看到了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大字报，说刘、邓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大家都感觉到刘、邓要倒台了。一些人怀疑自己的斗争方向。文艺宣传队的学生最先动摇，宣布脱离战斗师，造反了。长征队整个军心大乱，指挥官们驾驭不了，就让大家自由离京。元旦前后，一小部分人乘火车到广州等地串连或回自己家乡，大部分人回到了开封。

战斗师的大多数学生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毛泽东指引的“造反大方向”，但他们也决不愿与八二四为伍。他们有人提出，我们也“造反”，去省委机关“造反”。于是，几十个人从北京乘火车回郑州，组成“红卫革命造反兵团”直接进驻省委大院。郑州大学“二七公社”早已进驻省委大院，他们准备砸抢省委机关档案，红卫也就同二七合作。不过，二七只让红卫在楼梯口站岗。这是红卫兵团刚成立时最糟糕的胡闹行为，以致解放军驻开封师范学院军训团进校后，一直不支持、不承认“红卫”。

在开封的大部分遵义队成员开了一次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明确我们今后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会上有人提出，我们过去的大方向错了，组织应该解散。我则朗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几个段落，慷慨激昂地主张：公开检讨，扭转方向，不再与八二四作对，坚持遵义队组织不散，继续坚持战斗。头头无术，会议无结论结束，从此遵义队垮台。

这次大会之后，遵义二分队照常集体学习。有一次会，讨论：八二四要摧垮我们，我们如何应对？常呈才发言说，我们要团结一致，顶住压力。如果他们要揪斗我们的头头张佳魁，刘光耀顶上；如果他们又要揪斗刘光耀，我常呈才顶上……，要顶到底，反正我们不散伙。田继善在发言时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我们就加入，我们在他们的组织中发表我们的意见。田的这个发言，后来被某反戈一击者攻击为“从造反派内部搞垮造反派的阴谋”。另一次集会时，政教系东风队的几个人闯入会场，给我们上政治课，双方辩论一番。当我们离开会场时，发现室外墙上贴了几条攻击我们的标语，我们中的几位撕掉。此后，他们就写大字报诬蔑我们“撕毁毛主席语录”。

接下来，开封师院庞大的“老保”阵营所面临的，将是上海“一月风暴”的无情袭击。

其它各保守组织都受到了造反派的强力围攻，摇摇欲坠。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